

公民·视点 吴泓洲

公交司机



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浙江舟山市殡仪馆进行，许多仅与毕怀彬有一面之缘的乘客自发地来到殡仪馆为他送行。毕怀彬是舟山公交公司的一名司机，在5月27日舟山市的一起交通事故中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救了一车人。那天，他像往常一样，驾驶着29路公交车在路上行驶。前面同方向行驶的一辆中型货车左前轮毂突然脱落甩出，半人高的轮胎在路面上弹了几下后，被对面驶来的一辆黑色小轿车撞飞起来，砸向他所在的公交车，瞬间击穿了公交车前挡风玻璃，击中毕怀彬。公路边就是河道，方向盘稍偏一点，公交车就可能翻入河中。在那一刹那，毕怀彬踩了刹车，牢牢把住了方向盘，公交车向前缓慢滑行一段距离后，顶在了前面跑掉了轮胎的中型货车车尾，随后停了下来，而公交车的方向一直没有偏离。当医务人员到达现场时，发现他的头和脸上全是血，他的颈动脉已经停止跳动，最终他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。当现场念起毕怀彬生平的时候，哭声一片。“走好，毕怀彬！你是我们的大恩人！”不知哪位乘客喊出这么一句话，大家齐声喊着“恩人，走好！”

乡村教师



地处罗霄山脉深处的江西遂川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，而石门岭教学点正处在这个山区县的山中，从县城坐车到这里要近2个小时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都有一个梦想：走出大山。但陈清华和妻子却截然相反，他们从山里走来，而且越走越深。1992年，当听说一些乡村缺少老师时，在镇上一中学工作的陈清华毅然选择了进山支教。而妻子考虑到家庭团圆和丈夫独自支撑一个深山教学点不易，也放弃了自己收入颇丰的生意，背着3岁的独生女儿进了山。在随后的24年里，他们先后在滁州、下墩、上墩、石门岭等教学点工作，离家一站比一站远，条件一处比一处差。2009年以前，到教学点的公路还没有修通，孩子们吃的、用的都是陈清华用双肩从山外挑进来的。一百多斤的重担，一天的山路，他就这样挑了10多年。“在我之前，一代又一代的乡村教师都是这样过来的。”陈清华说他刚进山的时候，一名乡村教师就是在退休的前一天倒在了讲台上。近几年，陈清华先后获得“全国模范教师”、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、“新中国60年劳动模范40佳”等荣誉，也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大山，但他依然选择了坚守。他说，山里的孩子们需要他。

在贴进200多万元、替农民工维权了21年，办理的援助案件近400多件后，57岁的刘爱国仍然很忙。

为农民工打官司，赔本也值！

□本报记者 黄榆

57岁的刘爱国很忙，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，为来昆明的务工人员义务维权。在过去的21年里，刘爱国自己贴进200多万元，办理的农民工维权援助案件近400多件。他负责的云南外来务工人员维权中心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免费维权100多次。有人问他，你穷律师帮穷人打官司，图个啥？刘爱国却说，为农民工打官司，赔本也值。

活着做好事，落一个好口碑

“不好意思，这办公室有些简陋，但用的时间久了，农民工好找。”在云南省爱国律师楼劳动维权中心，刚刚接待完3位农民工的刘爱国一边收拾桌上的材料，一边说道。这间50平方米的办公室，被分隔成了两间，外面一间有两张办公桌，桌上堆放着各种材料，墙上挂满了农民工送来的锦旗，里面则是一间小会议室。

“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受家父的影响。”1959年，刘爱国出生在曲靖市师宗县城，一家五口人，他排行老二。父亲刘遵农当时在县委土改工作队任组长，“老爷子的人生坐标就是读书和做人”，刘爱国说，他是听父亲的话，才走上律师这行。

1977年，刘遵农到罗平县二杆镇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，主要是指导农户种植烟叶。只要农户有困难，刘遵农能帮的都要帮，要么借钱，要么出力，甚至把家里不算多余的粮食，送给农民救急。“父亲去世时，来了100多名乡亲为父亲出殡。从儿子的角度看，父亲的一生算是圆满了。”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刘爱国也养成爱读好书的习惯。1984年，在罗平县高级技术学校当老师的他，被学校派去云南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经济。他自己又在云南大学报名自学法律专业。1995年，曲靖市罗平县政府在昆明设立驻昆办事处，时任罗平县环城乡副乡长的刘爱国，成为驻昆办事处第一任主任。上任不久，在昆明打工的曲靖老乡主动找上门，请他帮他们讨要工钱。

“1986年，我就取得了律师资格证，办



图为刘爱国(右)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。

刘爱国供图

事处还有一辆公车可以用。”刘爱国觉得，自己具备必要的维权条件，再加上他父亲生前一直告诫他，活着要做好事，行善事。他就更没理由推辞了。

“我不怕，做事凭良心”

仗着主任和律师这两重身份，刘爱国找老板要钱还算是容易，在驻昆办这一年，他为3000多名曲靖籍农民工维权。“因为是老乡，能帮就帮，绝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1999年从原来的岗位辞职后，刘爱国以个人名义注册了罗平县个体私营企业驻昆办事处服务中心，同时继续坚持帮农民工维权。

2005年，刘爱国参与了昆明市委、市政府创建平安昆明的一项调查，发现外来务工人员维权困难的现象严重。之后，他组建了

云南省爱国律师楼劳动维权中心，专门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。

2008年3月17日，在昆务工的昭通民工钟显勇在检查机器时，右手臂不慎被机器压伤，送往医院抢救，做了右前臂残端修整手术。后因医疗费用问题发生争议，他的公司只愿意补偿1万元，钟显勇不同意。

2009年4月15日，刘爱国律师成为“昆明·五一·工人维权律师志愿团”第一批志愿团的律师代表。钟显勇在农民工维权咨询会上遇到了刘爱国。在刘爱国的帮助下，钟显勇重新进行了工伤认定，伤残等级鉴定为五级，“做梦都没想到，没花一分钱，刘律师就为自己争取到了10万元赔偿款，我真是遇上了好人。”钟显勇说。

“人好，没有架子，多小的问题都帮助我们解决，而且不收任何费用。”刘爱国被越来

越多的来昆务工人员所熟悉。

从2006年的“小姚跳楼维权案”，2007年的“钻石女工维权案”，2008年的“苟大勇劳动维权上访案”，2009年的“伍文奎挟持人质讨薪无罪释放案”，2010年的“李华百万维权讨薪案”，到2011年的“杨国荣夫妇讨薪案维权”……这些被媒体高度关注、难度很大的维权案，到最后，都被刘爱国一一啃下来，并取得了胜诉。

但整个维权中心就他和两名志愿律师。很多维权案难度大，周期长，加上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不懂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造成取证艰辛。

为了帮农民工维权，刘爱国得罪了很多企业的老板。有的甚至打电话威胁他，“你给我小心点”。

刘爱国总会告诉对方，“我不怕，做事凭良心，你们要来就来”。

呼市万辆公共自行车六成受损

公车，咋就这么“不耐骑”？

有关人士称：“如果大家能爱惜公车、规范用车，很多车辆损耗都能及时避免。”

本报讯（记者李玉波）公共自行车自2013年10月走进呼和浩特市百姓的生活，至今已两年多。但是，由于一些市民缺乏公德意识，对公车不爱惜、使用不规范等问题，1万多辆投放的自行车中，高达65%存在受损现象。

2013年呼和浩特启用公共自行车系统至今，已运营的服务站点由最初的120个增加至330个，公共自行车数量由最初的5100辆增至10140辆，“日均租还数量已突破6万次，是自行车投入量的6倍。”呼和浩特市环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城环公司”)运营部白杨说，现在平均每辆车日均使用20次左右。用户递增的“爆棚”，甚至一度导致呼和浩特公共自行车办卡业务停办。

然而，与用户递增“爆棚”相对应的，却是

公共自行车居高不下的受损率，近日，记者走访了呼和浩特东影南路两侧的公共自行车站点，发现各站点公共自行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。一些市民在取车时，未等自行车从导槽滑出，就强行拖拽车辆。

“公共自行车骑行率、车辆使用率越来越高，车辆损坏率也随之倍增。”白杨介绍道，现在运行的1万多辆公共自行车损坏率高达65%。其中，5%来自部分市民的暴力“虐车”，35%由于市民对公车不爱惜，使用不规范，只有25%才是缘于自行车自然折旧。

“每天咱这儿维修自行车就有100辆到130辆左右”，城环公司修理中心负责修理公共自行车的郑军一边装卸自行车连卸，一边说，共5人的修理小组平均每天每人要维修20多辆自行车。以自行车速即维修更换为

例，每100辆维修的破损车辆就有20辆需要更换连卸。

他发现，每次送到这里来的公共自行车，大多是车筐、车座等零件被人拆掉，或者是被加装后座、车锁，或是实心轮胎换成了充气轮胎。

郑军很疑惑，“市民自己的自行车骑上两三年都能光洁如新，为什么公共自行车投放市场两三个月就破烂不堪？如果大家能爱惜公车，规范用车，很多车辆损耗都能及时避免。”事实上，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其他省市早已先行。智能化运营管理的公共自行车系统自2007年入驻中国，现在全国共计超过100座大中城市开展公共自行车试点。但记者了解到，这些试点城市普遍存在破损率居高不下的问题。

公民·人物

倾情大山19年

郭红英 “大妈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给你送点吃的来了。” “谢谢你了，这么多年多亏你和井区照顾我们祖孙俩，隔三差五的给我们送东西……”今年5月1日，家住长庆油田采油二厂上里塬井区附近的大妈安玉英，蹒跚地走上前，拉住井区长汪海勇的手，几度哽咽中欲言又止。安大妈是上里塬井区里2个计户区附近的一户村民，因家中几遭病痛和灾祸之后，只剩下她和10多岁患有肾炎的孙子，她们的家身居大山深处，离最近的小镇也有30多公里的泥土路。没有劳动力、没有经济收入，祖孙两的生活很困难。2009年，再次调入上里塬井区的汪海勇，在一次处理纠纷中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，第二天立即购买了米、面、油等送往安大妈家。在以后的几年中，汪海勇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们送生活急需用品，逢年过节更是

不会忘记祖孙二人。“他们一老一少能吃多少啊，我们平时少抽点烟，少喝点饮料都够他们生活了。”

在上里塬油区，汪海勇不仅是众人眼中的“形象代言人”，更是井区的管家人。从1994年参加工作到2006年，汪海勇在采油二厂岭北作业区最远、最偏僻的上里塬井区一待就是12年，从刚开始的驻井工到井区大班、班站长、副井区长，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。2001年冬天，汪海勇刚担任副井区时，正值油区综合治理最不稳定时期，为了保证井区原油产量不受损失，他白天带领大班处理井区应急工作，晚上再投入到紧张的防盗防偷工作中。累了，就裹着大衣在车上休息片刻，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不回宿舍。

一袋袋原油、一辆辆盗油农用车在他们的一守中，而他却因为在连续在寒冬里坚守，得了严重的关节炎。可他却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，被井区的同事称为“拼命三郎”。面对这样的称呼，汪海勇笑着说：“拿了企业的钱就要干好活，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就行。”

2006年，汪海勇被作业区调回岭1井区担任井区长，直到2009年因上里塬井区管理滞后，汪海勇再度被调入上里塬井区。面对井区油井分散、人员用工复杂、人员思想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，汪海勇一边严抓管理，一边抽空和员工拉家常，了解员工的思想，在帮助员工解决生产难题时，也在生活上时时刻刻关注员工。对即将退休的老师傅及时调整岗位，不倒夜班；里56计小班员工许娟因为怀孕不能劳累，汪海勇第一时间给安排到井区协同管理后勤工作……

公德是什么？是——“恶”要小也不为！



2016年5月19日，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参观。部分游客不顾现场“文物神圣，禁止攀爬”警示牌的警示，攀爬到有“中华瑰宝”之称的唐开元大铁牛的身躯上拍照留念。视觉中国供图